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把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位

□胡国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在提高认识、增强党性、规范权力运行、从严监督执纪、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等方面进一步落实到位。这是对党的自我革命的再动员再部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五个“进一步落实到位”既从不同的维度层次精准标示了推进自我革命的重点环节,更以系统的顶层设计有效形成了环环相扣、压茬推进的抓落实工作闭环,为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提供了战略引领,明确了实践路径。

自我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当前要坚决破除自我革命“麻烦论”“过头论”,尤其是“与己无关论”等错误观点束缚,克服“松劲歇脚”的麻痹思想,摒弃“看客心态”和“毕其功于一役”的简单思维,每个党组织和每名党员干部都肩负着自我革命的责任,都要把自己摆进去,绝不能把自我革命当成口号喊,更不能当成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要把自我革命这根弦绷得更紧,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锤炼坚强党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党性既有真伪之别,亦有成色之分,党性强,就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党性弱,久而久之就会“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导致蜕化变质。打铁还须自身硬,增强党性修养,既要抓住重点,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又要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容不得半点含糊和虚假,要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不畏人知畏己知”,不断提升政治免疫力,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永葆政治本色。

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形成有效制约监督权力运行的长效机制。规范权力运行是自我革命的关键环节。权力要产生作用就必须运行起来,关键要看是什么轨道上运行,是“公转”还是“自转”,“公转”是在公共轨道上运行,确保权力因“公”而转,其功能是为民服务;“自转”是在私下轨道上运行,破坏了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的正常秩序,这种“变

异”的权力因“私”而转,其企图是以权谋私。当前各种不正之风根源在于特权思想,花样翻新的腐败现象本质都是以权谋私。因此,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规范权力运行就是要切实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透明清晰可追溯的制度机制,不断堵住权力运行漏洞,及时补齐制度短板,破“潜规则”,立“明规矩”,有效提高制度执行力,避免“牛栏关猫”“纸笼禁虎”,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始终确保权力运行的正确方向,坚持权力为民所用。

自我革命是刀向刀内、刮骨疗毒、去腐生肌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过程。在自我革命的伟大征程中,没有桃花源,也不会有避风港,更不存在禁区。但当前监督执纪中存在的一个明显现象,就是违法违纪案件查处中被动挖出来的多、主动揭出来的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部分党组织身怀利刃却并未出鞘。要彻底改变这种现象就必须把党组织日常监督真正抓起来,将党风廉政建设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以霹雳手段提高穿透力,通过同查同治斩断风腐共生的藤蔓,通过揭开“风”的盖子揪出“腐”的真面目,明确释放一严到底、寸步不让的信号,有效形成警钟长鸣、利剑高悬的高压震慑。

进一步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令人警醒的是,当前仍有部分党员干部干政政治上麻木不仁,导致管党治党责任形同虚设。进一步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既要从责任观念上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政绩观,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又要从责任体系上进一步完善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完整责任链条,确保每一种责任都要严格落实,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作者:胡国喜,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教授)(据《光明日报》)

从思想和利益根源上破解作风问题

□余秋石

作风问题绝非表面现象,之所以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是因为有着深刻的思想和利益根源。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履行政治责任,勇于直面思想和利益的根源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取得实效,推动作风建设真正深入下去、持久见效,直至化风成俗。

抓作风建设,关键在于思想的转变。从思想根源上入手,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党员干部要带头坚定理想信念,从理想信念中获得察大势、应变局、观未来的指路明灯,获得奋斗不止、精益求精的动力源泉,获得辨别是非、廓清迷雾的政治慧眼,获得抵御侵蚀、防止蜕变的强大抗体。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用好党内政治生活这个重要法宝,让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大熔炉”中勇于自我省察、自觉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以宝贵党性滋养增正气、祛邪气、强免疫、固根本。加强正确政绩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将对理想信念的坚定和执着落实到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在履职尽责、奋发有为中践行根本宗旨、检验初心使命,努

力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

从根本上解决作风问题,必须抓住利益这一核心要素,铲除利益驱动的土壤,斩断利益输送的链条。祛沉疴、治顽疾,必须彻底整治作风问题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破解背后的利益链条和“负反馈”机制,激浊扬清、去伪存真,让歪风邪气没有市场,让正气充盈成为主流。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完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严把选人用人作风关,大力选拔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持续落实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政策措施,更好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以正确的用人导向推动形成崇尚实干、务求实效的干事导向。加大作风问题监督检查力度,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特别是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结合起来,重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前哨”作用,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对作风问题做到坚决查处、及时整改、严肃问责,持续形成强有力的警示效应。持续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把党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据《新疆日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城市体系是由不同规模等级、差异化职能分工和具体空间区位分布的城市所构成的有机网络整体,其发展水平取决于城市之间的等级规模关系、职能互补关系、时空交互关系的动态平衡。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是在国土和区域尺度上谋篇布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是持续优化区域统筹、城乡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大格局的重要过程。

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

□尹稚

◎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议题的回应,也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要举措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人口和用地要匹配,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并提出了“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等要求。近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是更加全面科学理解和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体现。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既包括资源、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也包括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承载力,反映了城市系统是自然禀赋和人工建设改良共同构成“复杂巨系统”的特征。这一概念有阈值性和动态性

◎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是对中国城市区域协同发展的强调,也是对经济效率与人的舒适如何达成动态平衡的精准回答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建设高能级中心城市、培育现代化都市圈,到引导人口向城市群集中、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同时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统筹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and 国土空间体系。近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表述体现了相关政策的连续性,增加的“组团式、网络化”表述,是对城市发展格局和形态更为具体和形象化的描述。“组团式”是针对城市发展进一步纠正“摊大饼”现象而言的,“网络化”则体现了对现代化进程中“流动性”的强化和“流空间”重要性的提升。

纵观全球城市发展史,选择连缀扩张“摊大饼”的方式,还是更具田园化、花园化、公园化特征,城乡优点共融、人与自然关系更加融洽的组团式发展

◎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对稳住城镇化基本盘、补足短板的深刻认识,也是推动县城差异化发展的科学选择

城镇化的成本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分担。目前我国收入水平决定了在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选择中,县城仍是多数人的首选。县城或者县级治理单元城市就是中国城镇化的基本盘,这个基本盘的动态特征十分明显,青壮年时“人往高处走”,中老年后“落叶归根”,都会对人口结构产生影响,致使县城职能反映出人生“驿站”特征,即常住量大、永居性低、流动性突出。这个特征导致此类中小城市规划建设中往往存在前瞻性不足、“过客”心态等问题,也使得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需要长周期经济测算的支撑系统依赖上级政府投入,自身动力往往不足。这也是将县城作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

两个特点。前者强调的是“上限”和“临界点”,即在不引发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和社会失序的前提下,城市及其相关基础设施所能支撑的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活动强度存在“上限”,突破“临界点”会产生近乎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后者则反映了人类改造利用资源环境综合能力的进步、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也反映了社会组织形态、保障能力乃至制度变革对人口发展质量和社会稳定的贡献。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力是城市体系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约束性前提,而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承载力的提升与变革则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涵。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所面对的发展环境充满新的挑战,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越来越重要。我国山地多、平原少,近三分之一国土属于难以开发利用,不适宜生活、居住和生产的

模式,实际上是在回答经济效率与人的舒适如何达成动态平衡这一重要议题。从经济价值的视角看,效率是永恒的坚守。更高的开发强度、更紧密的布局方式、更紧凑的职能联系都意味着效率的提升,同心圆式的圈层扩张契合各种经济学说中有关效率分析的理论模型。但从宜居的视角看,城市是生活的家园,“诗意的栖居”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涵。如果放任城市按照自组织形态发展,其结局将是把效率推向极致,在享受高效率的同时忍受拥挤和资源挤兑产生的焦虑,这就是“大城市病”的由来。反之,如果放纵对舒适的追求,也会带来更大资源消耗、更高的发展成本浪费和非理性运营成本支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规划、建设和运营,就是要通过政策调控、规划引领、建设形态选择和运营方式优化,达成效率和舒适的动态平衡。要保护好生态优先的绿色基底,实现山水林田湖草与城市空间的优化耦合,以蓝绿空间对城市组团的穿插渗透来创造碳汇体系,应对极端气候,实现碳汇和韧性双重提升。增强蓝绿空间可达性,更好服务于居民公共活动,也推动生态服务价值外溢,催生绿色金融、生态旅游、教育文创等新经济动能,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重场景的有机融合。

短板重点的初衷。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重点强调“分类推进”,突出了县城发展的关键之处,其原因在于县级治理单元的高度差异化,这反映在空间尺度、人口规模、区位和主体功能等方面。我国辖区面积大的县超过20万平方公里,面积小的县不到90平方公里;人口多的县接近250万人,人口少的县不足万人;区位得天独厚的县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俱全,偏远地区的县尚存不通高速之处。主体功能差异来自国家功能需求,有的县国家级生态保护区几乎占县城全部,有的县作为农业主产区,首要任务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推进农业现代化,有的县级市在城市发展重点地区,可谓“富可敌省”。用“一把尺子”衡量县城发展、考核县级干部无疑不够科学,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治理的复合测度中,把准一个县的定位和特征进行分类施策考核,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是把县城作为城镇化重要载体,寻求特色化、专业化发展道路的重点。

城市更新需要综合立体的交通网络

□钱勇生

组作为城市核心节点布局,以站城一体开发理念高效整合国家高铁网、区域城际网、城市轨道交通及地面公交系统,在规划层面实现“一张图”融合,为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重要一极塑造了坚实骨架。

城市内涵式发展,关键在于土地地下空间的高效复合利用。通过高架、隧道、地下通道、综合管廊与交通设施一体化设计,最大限度释放地面空间用于公共活动与生态景观。交通枢纽正从单一换乘点向集成交通、商业、办公、居住、文化等多功能的“微城市”转型。例如,深圳福田综合交通枢纽在地下五层立体空间中,无缝集成广深港高铁、城市地铁、公交场站、出租车接驳、商业及市政管廊等。创新的竖向分层设计,实现了日均数十万人流的高效集散与零距离换乘,释放的地面空间化身为高品质的“深圳公园”,为“美丽城市”筑牢了绿色根基。

智慧韧性,筑牢安全底线。构建融合物联网、车路协同等技术的“数字孪生”交通系统,实现全域全息感知与在线推演,为主动管控提供决策支持。建立涵盖多种交通方式的统一调度与应急联动机制,在极端天气、大客流或突发事件发生时,迅速启动跨模式应急疏散预案,保障城市生命线畅通。例如,上海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构建了覆盖全市路网、轨道交通、枢纽的“数字孪生”体系。在台风等极端天气来袭时,平台能够精准预测积水点和拥堵传播态势,提前调度公交应急运力,调整地铁运行图,开放沿线建筑作为临时避险点,并通过App向市民实时推送预警和替代路线,成功保障了极端天

空间。传统农业高产区与城市化适宜地区高度重叠,自然资源和环境禀赋上限不容乐观。在保障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前提下寻求城市体系发展,更多需要依靠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承载力的提升,在有限的可用资源环境阈值内做文章。既要守好“美丽中国”的家园,又“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必然要求坚持集约高效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坚持减排降碳、增蓝扩绿,恢复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坚持扩充基础设施容量,提升运行质量,强化对城市运行的支撑服务能力;坚持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容量、提升财政能力,为人口和经济活动提供可持续资源保障;坚持大力发展教育、医疗为主的高质量公共服务,提升对人口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的保障能力等。

网络化是城市体系职能组合和组团式城市高效舒适运转的另一必备条件。城市发展的区域协同和组团式形态,与现代化进程带来的要素流动性提升和“流空间”重要性上升相伴。实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与其他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乃至乡村进行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是防止社会失序、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治愈“大城市病”的过程。要在舒适的环境中保有足够的效率,就需要网络化的强化。中国几十年来基础设施投入,大大降低了信息、能量、物质、人才在各尺度上交互的成本,使得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中的“流空间”建设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组团式发展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网络化则解决了流动性增加带来的紧密时空关系建立问题,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达成更为丰富的多种职能“同城化”效果。因此,应强调网络化互联互通推动“空间邻近”效应,强化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及城乡之间的专业化、特色化发展,实现人口、资源、文化等多方面的优势互补。推进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同城化”共享,促进跨区域、跨人群的待遇均等,既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也促使居民实现“跨城如同城”和“城乡双栖”的高品质生活。

县城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中枢,乡村发展的动力来源相当一部分在城市。从保障性和市场化结合为城市提供“菜篮子”“米袋子”,到融入城市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消费链等链群关系,都可以看到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及乡村振兴战略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和强烈的融合需求。在解决从乡到城的人口流动问题,打通了绝大部分政策渠道之后,需要聚焦从城到乡的流动渠道畅通,而县城是中转站、中枢,这个枢纽强化得好才会有城乡融合更广阔的前景。

总之,一个现代化、日益优化的城市体系是等级规模合理完备、公共服务覆盖充分,职能分工提质增效,空间分布更加均衡,互联互通更加顺畅的网络整体。新征程上,要更加注重统筹协调,着力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城市发展的持续性,推动城市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尹稚,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据《光明日报》)